

中国语言文学文库·学人文库 吴承学 彭玉平 主编

# 未完成的现代性： 20世纪中国文学思想史论

胡传吉 著



中山大學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语言文学文库·学人文库 吴承学 彭玉平 主编

# 未完成的现代性： 20世纪中国文学思想史论

胡传吉 著



中山大學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 广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未完成的现代性：20 世纪中国文学思想史论/胡传吉著.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9. 6

(中国语言文学文库·学人文库/吴承学，彭玉平主编)

ISBN 978 - 7 - 306 - 06580 - 3

I. ①未… II. ①胡…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思想史—研究—近现代 IV. ①I209.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31318 号

---

出 版 人：王天琪

策划编辑：嵇春霞

责任编辑：陈 霞

封面设计：曾 斌

版式设计：曾 斌

责任校对：高 洵

责任技编：何雅涛

出版发行：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编辑部 020 - 84110283, 84111996, 84111997, 84113349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510275 传 真：020 - 84036565

网 址：<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mailto: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广州家联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787mm × 1092mm 1/16 13.25 印张 175 千字

版次印次：2019 年 6 月第 1 版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58.00 元

---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 中国语言文学文库

编 委 会

主 编 吴承学 彭玉平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坤 王霄冰 庄初升

何诗海 陈伟武 陈斯鹏

林 岗 黄仕忠 谢有顺

# 总 序

吴承学 彭玉平

中山大学建校将近百年了。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万方多难之际，手创国立广东大学。先生逝世后，学校于1926年定名为国立中山大学。虽然中山大学并不是国内建校历史最长的大学，且僻于岭南一地，但是，她的建立与中国现代政治、文化、教育关系之密切，却罕有其匹。缘于此，也成就了独具一格的中山大学人文学科。

人文学科传承着人类的精神与文化，其重要性已超越学术本身。在中国大学的人文学科中，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设置更具普遍性。一所没有中文系的综合性大学是不完整的，也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在文、理、医、工诸多学科中，中文学科特色显著，它集中表现了中国本土语言文化、文学艺术之精神。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曾认为，语言、文学是所有学术研究的重要基础，“一切之学必以文学植基，否则难以致弘深而通要眇”。文学当然强调思维的逻辑性，但更强调感受力、想象力、创造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有了文学基础，才可能做好其他学问，并达到“致弘深而通要眇”之境界。而中文学科更是中国人治学的基础，它既是中国文化根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一个关键交集点。

中文系与中山大学同时诞生，是中山大学历史最悠久的学科之一。近百年中，中文系随中山大学走过艰辛困顿、辗转迁徙之途。始驻广州文明路，不久即迁广州石牌地区；抗日战争中历经三迁，

初迁云南澄江，再迁粤北坪石，又迁粤东梅州等地；1952 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始定址于珠江之畔的康乐园。古人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对于中山大学中文系来说，亦是如此。百年来，中文系多番流播迁徙。其间，历经学科的离合、人物的散聚，中文系之发展跌宕起伏、曲折逶迤，终如珠江之水，浩浩荡荡，奔流入海。

康乐园与康乐村相邻。南朝大诗人谢灵运，世称“康乐公”，曾流寓广州，并终于此。有人认为，康乐园、康乐村或与谢灵运（康乐）有关。这也许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不过，康乐园的确洋溢着浓郁的人文气息与诗情画意。但对于人文学科而言，光有诗情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必须具有严谨的学术研究精神与深厚的学术积淀。一个好的学科当然应该有优秀的学术传统。那么，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学术传统是什么？一两句话显然难以概括。若勉强要一言以蔽之，则非中山大学校训莫属。1924 年，孙中山先生在国立广东大学成立典礼上亲笔题写“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十字校训。该校训至今不但巍然矗立在中山大学校园，而且深深镌刻于中山大学师生的心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是孙中山先生对中山大学师生的期许，也是中文系百年来孜孜以求、代代传承的学术传统。

一个传承百年的中文学科，必有其深厚的学术积淀，有学殖深厚、个性突出的著名教授令人仰望，有数不清的名人逸事口耳相传。百年来，中山大学中文学科名师荟萃，他们的优秀品格和学术造诣熏陶了无数学者与学子。先后在此任教的杰出学者，早年有傅斯年、鲁迅、郭沫若、郁达夫、顾颉刚、钟敬文、赵元任、罗常培、黄际遇、俞平伯、陆侃如、冯沅君、王力、岑麒祥等，晚近有容庚、商承祚、詹安泰、方孝岳、董每戡、王季思、洗玉清、黄海章、楼栖、高华年、叶启芳、潘允中、黄家教、卢叔度、邱世友、陈则光、吴宏聪、陆一帆、李新魁等。此外，还有一批仍然健在的著名学者。每当我们提到中山大学中文学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些

著名学者的精神风采及其学术成就。他们既给我们带来光荣，也是一座座令人仰止的高山。

学者的精神风采与生命价值，主要是通过其著述来体现的。正如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谈到孔子时所说的：“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真正的学者都有名山事业的追求。曹丕《典论·论文》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真正的学者所追求的是不朽之事业，而非一时之功名利禄。一个优秀学者的学术生命远远超越其自然生命，而一个优秀学科学术传统的积聚传承更具有“声名自传于后”的强大生命力。

为了传承和弘扬本学科的优秀学术传统，从2017年开始，中文系便组织编纂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文库”。本文库共分三个系列，即“中国语言文学文库·典藏文库”“中国语言文学文库·学人文库”和“中国语言文学文库·荣休文库”。其中，“典藏文库”（含已故学者著作）主要重版或者重新选编整理出版有较高学术水平并已产生较大影响的著作，“学人文库”主要出版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原创性著作，“荣休文库”则出版近年退休教师的自选集。在这三个系列中，“学人文库”“荣休文库”的撰述，均遵现行的学术规范与出版规范；而“典藏文库”以尊重历史和作者为原则，对已故作者的著作，除了改正错误之外，尽量保持原貌。

一年四季满目苍翠的康乐园，芳草迷离，群木竞秀。其中，尤以百年樟树最为引人注目。放眼望去，巨大树干褐黑纵裂，长满绿茸茸的附生植物。树冠蔽日，浓荫满地。冬去春来，墨绿色的叶子飘落了，又代之以郁葱青翠的新叶。铁黑树干衬托着嫩绿枝叶，古老沧桑与蓬勃生机兼容一体。在我们的心目中，这似乎也是中山大学这所百年老校和中文这个百年学科的象征。

我们希望以这套文库致敬前辈。

我们希望以这套文库激励当下。

我们希望以这套文库寄望未来。

2018 年 10 月 18 日

吴承学：中山大学中文系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彭玉平：中山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 前 言

讨论“未完成的现代性”这一议题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联想到，1980年哈贝马斯在接受阿多诺奖时发表的著名演说《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方案》。哈贝马斯针对西方现代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工具理性驱动带来的现代危机，及后现代理论的冲击，提出以沟通理性重建现代之合法性，并认定现代性作为一项宏伟的历史工程，尚未完成，而且具有开放性，在不断发展。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后期危机的反思虽与我们在中国语境中思考“未完成的现代性”有相关之处，但并不完全是同一个层面的问题。

关于“现代性”这个话题的讨论，首先必须面对这个术语的普遍性和不确定性。在社会伦理、科学理性、文化思潮、审美趣味、哲学思考以及日常生活的不同范畴下，对“现代性”这一概念的理解和表述都存在分歧。但是，有一点始终不可否认，“现代性”具有强烈的时间意识和历史意识。正如卡林内斯库所言，“只有在一种特定时间意识，即线性不可逆的、无法阻止地流逝的历史性时间意识的框架中，现代性这个概念才能被构想出来”<sup>①</sup>。

“现代”（modern）这一概念在时间上的指陈比较宽泛，从词源的角度来看，西文中“modern”来自拉丁语中的“modernus”，用来表示“最近”“此刻”，与“古代”相对。从这个角度来说，中世纪之后的西方都可以被看作处于“现代”，例如，黑格尔就认为，15世纪新大陆的发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带来了现代与中世纪之间的时代分水岭。也有人认为，历史上“现代”文化应该

---

<sup>①</sup> [美] 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8页。

从 18 世纪中期法国的理性主义启蒙运动算起。在文学研究领域，更普遍的看法是 19 世纪后期 20 世纪初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新的经济结构的形成、传统理性主义思想的动摇，才是“现代”社会的发端。

然而，如果放眼世界，希望对“现代”这个概念做出统一的时间划分，无疑是徒劳的，因为各国的科技、经济、文化以及思想发展的进程不可能完全同步。

就中国社会“现代性”进程而言，学界往往会将眼光投向晚清。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一文发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设问，指出中国“现代性”历史起源于晚清，和西方“现代性”的发展存在“时间的落差”，是一种被耽误（belatedness）的现代性。晚清中国社会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无论是经济生活、社会结构，还是文化观念，均在西方进逼之下，不得不发生改变。国家民族之危机、市民阶层的兴起、传播技术和媒介的发展共同酝酿了晚清中国“现代性”的发源。在文学发展中，文学语言、观念、创作体式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与传统的断裂，更多转向以西方现代所强调的理性、启蒙、进步、自由等人文精神作为参照。与此同时，中国“现代性”的话语又因为本土的大忧患和变局，始终包含着为国族之未来找寻出路的诉求。“现代性”的问题发轫于西方，但它已经跨越地域，而成为各个民族和国家以自身方式面对、参与以及建构的一个现象。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现代性”具有自身的特殊性，绝不可将其理解为一种融入西方文明的定向运动，而应该看到其鲜明的本土性特征。

如果暂时搁置历史和时间的框架，我们可以将“现代性”作为一种态度和行为方式去理解。按照福柯的解说，“现代性”是一种时代的态度和精神气质，一种思想和经验的方式，一种和现实发生关联的办法。在讨论中国文学“现代性”之发生的时候，也有

学者将其定位为“人的现代性体验之发生”<sup>①</sup>。人之体验，必然离不开其所处的社会现实。中国社会所面对的现实问题、中国文化所面对的迫切挑战，都和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遭遇有相似之处，但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中国的现代意识“既包含了我们对于新的时间观念的接受，同时又包含着大量的对于现实空间的生存体验”<sup>②</sup>。这一接受及体验之过程，是中国社会自晚清以来应对危机的过程，也是中国“人”之发现生长的过程，对于中国语境而言，具有更加实质的意义。因此，在谈论“现代性”这个话题的时候，必须看到中西话语之间的共通与错位。中国语境中的“现代性”有对西方现代价值的模仿和承袭，同时也融贯了不可剥夺的本土经验与思维。中国作家对自身生存经验的感知与积累，为丰富而复杂的中国“现代性”提供了最好的证词。

---

① 王一川：《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② 李怡：《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批判的批判》，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8页。

# 目 录

第一章	20 世纪中国文学思想的一种变迁·····	1
第二章	“群治”理想·····	21
第三章	“人的发现”·····	51
第四章	新道德与城乡之争·····	91
第五章	现代性的追问·····	144
后 记	·····	196

## 第一章 20世纪中国文学思想的一种变迁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文学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主要是相对“二十世纪中国广义革命文学”而言的。80年代中期以后，“活着”之道的来临，在事实上终结了20世纪中国广义革命文学所推崇的“牺牲”<sup>①</sup>之道。

革命文学发端于仇恨，20世纪中国广义革命文学的源头在清末。清末，尤其是在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出现一些以革命为主题的作品，如“种族革命小说”<sup>②</sup>（或可称之为“政治小说”<sup>③</sup>的一种）、邹容等的政论文、流派之外的革命文学等，这些皆可归入广义革命文学的范畴。清末的革命文学，仇恨情绪一目了然。矛头对准“满人”<sup>④</sup>、洋人、奴隶，核心思潮是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其中，对奴隶的痛恨是清末革命文学异于后世革命文学的地方。总体而言，清末的革命文学，道义谴责的特征明显：虽不乏反对“排满”者，但对人种之“种”的革命，实最为突出。“排

---

① 本书所指的“牺牲”，主要强调其献祭之象征意味，包括舍生取义，但内涵比舍生取义要大。

② 阿英认为，“晚清小说活动中最激急最进步的洪流，为伴着民族革命运动而起的‘种族革命小说’。这些小说，是以宣传革命思想，鼓动革命情绪，使人民同情、参加，以完成中国的种族革命为任务。当然是属于禁书之流。作品往往说教多于描写，完全反映了一种新艺术的初生形式，还不够把自己要发展的思想形象化起来。但可以断言，这些初期的作品，在艺术上虽未臻完善，在对读者的政治影响方面，一定是很巨大的。研究晚清小说，最被忽略又最不应忽略的，就是这最发展的一环”。参见阿英《晚清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89页。

③ “政治小说”的范畴要比“革命文学”大，它还包括“立宪文学”等怀有政治理想的作品。

④ 书中关于“满人”“排满”“仇满”“贼满”等语实为清末“种族革命小说”中的时代语言，为避免歧义，凡书中涉及此类词语，均加标双引号以示区别。

满”者的核心价值及策略是人种革命，在他们的笔下，“满人”、洋人、奴隶等斗争对象，都是按“种”来区分而不是按“人”来区分，更非按“阶级”来区分。比之人情小说、狭邪小说、侠义小说、公案小说及谴责小说等，清末革命文学确实是“最被忽略又最不应忽略的，……最发展的一环”<sup>①</sup>，它与创造社首倡的同情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延安文学及后延安革命文学一起，暴露黑暗，歌颂光明，渴望公有，借叙事转述观念，陆续建构以“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为重心的革命文学。以“争心”为主的革命文学，有其独特的“牺牲”之道。

清末革命文学最深层的思想资源多来自古典，尽管相关作品中不时提到卢梭、加富尔、加里波第、俾斯麦、弥勒约翰等，常用美国、法兰西、瑞士等来点缀，平等自由的说法时见于笔端，平民与民间的诉求得到展现。一些小说甚至设计了民主演练的场面（如陈天华《狮子吼》），但来自古典的天下观基本不变，骨子里仍然是顺乎天应乎时的“汤武革命”观，多数作者对世界及宇宙的理解，没能彻底摆脱朝贡体系下的天下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清末革命文学里的仇恨观及乌托邦之想，以及为了实现乌托邦而不顾一切的牺牲之道，对后世的革命文学有启蒙作用。

仇恨观是清末革命文学中的重要思想。

“种族革命小说”与邹容等人的政论文可归入“种族革命文学”的范畴。一些作品，仇恨情绪强烈。托名犹太遗民万古恨著、震旦女士自由花译的《自由结婚》<sup>②</sup>，以说教的口吻，表达了强烈的仇恨感。作者在《弁言》称，“全书以男女两少年为主，约分三期。首期以儿女之天性，观察社会之腐败。次期以学生之资格，振刷学界之精神。末期以英雄之本领，建立国家之大业”。才子佳人

<sup>①</sup> 阿英：《晚清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89页。

<sup>②</sup> 犹太遗民万古恨著：《自由结婚》，震旦女士自由花译，自由社1903年版。全书共2编20回，故事未完，黄祸是否得救未知。

之老套故事为虚，政治及道德教育说教为实。作者在第二回里影射痛批国人，“说来也奇怪，他国里边没有什么君主，没有什么贵族，没有什么平民。大约可分为两种：一种叫做盗贼，一种叫做奴隶”，盗者为皇，奴隶盲从顺从，改朝换代就在盗贼之间轮回。小说第三回，明白道出英雄黄祸<sup>①</sup>的使命是“替国雪耻，替父报仇”，同时借黄祸母亲之口，道出三大仇人，“第一仇人是异族政府；第二仇人是外国人；第三仇人是同族奴隶”。国耻家恨，两相权衡，又似国耻更重。《自由结婚》第三回写到关关小姐与马夫发生争执，关关执意要将马夫送官究办，乳母以国耻晓以利害，关关大梦顿醒，决心以国耻为重，不为难自己人。“满人”、洋人、奴隶究竟可恨在哪里，语焉不详，仇恨的姿态却得到充分表现，小说核心的政治用意在于弃立宪、闹革命。另有《洗耻记》<sup>②</sup>，其篇首《苦学社主人记》引岳忠武王之《满江红》，叹“女史立志之坚”，歌曰“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小说讲的是报仇雪恨事，亡国恨之最恨是“野蛮民族贱牧人”亡了“汉国”，作者斗争的重点是“满人”，修辞意味是旧式的正统家国观，故事粗劣，影射显白，但恨声强烈。人种论是陈天华小说及政论文的基本出发点，达尔文的进化论与赫胥黎的竞争论是其理据。其章回体未完小说《狮子吼》<sup>③</sup>，混野史正史为一体，愤华夷混种，将革命等同于“排满”，“排满”优先于排外。其政论文《猛回头》<sup>④</sup>开篇亦论人种，直言华种受异种压制，世界上白、黄、黑、棕、红五种人，白

① “黄祸”之得名，源于父亲黄人杰之死。黄人杰祸起仇教，被定死罪，黄祸乃遗腹子，其母曰，“唉！汝生的那一天，正遇此非常大祸，所以我就替汝取了这祸的名字”（第三回）。

② 汉国厌世者著，冷情女史述：《洗耻记》，湖南苦学社发行，1903年日本印，全书共六回。

③ 小说原载《民报》，本书参考《陈天华集》（全一册，下编），陈天华遗著，民智书局1928年版。

④ 陈天华：《猛回头》，见《陈天华集》（全一册，中编），民智书局1928年版。

种最强，黄种次之，余者皆受白种压制。《中国革命史论》<sup>①</sup>及《警世钟》<sup>②</sup>等，皆视“满人”为汉人的最大威胁。邹容的《革命军》<sup>③</sup>很少被纳入文学的范畴进行考察，其文虽以政论为主，但主要以文学修辞及斗志取胜<sup>④</sup>，感性十足，影响巨大。后世革命文学擅长以情绪与说教服务于政治，虽与政治的关系不尽相同，但从表现手法来看，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处，将《革命军》等政论文纳入广义革命文学的范畴来讨论，是合适的。《革命军》“绪论”言明革命的目的是“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并寄望于卢梭等诸大哲之力，助汉种文明起死回生；第二章“革命之原因”，斥“贼满人”对汉人的压制，直呼“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第三章“革命之教育”，痛斥国人“五官不具，四肢不全，人格不完”，要改变此状，须革命与教育同行，使人知国知平等知自由知法律；第四章“革命必剖清人种”，抒发对“满人”的仇恨；第五章“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称“中国人无历史。中国之所谓二十四朝之史，实一部大奴隶史也”；第六章“革命独立之大义”，对共和政体及相关制度进行初步设想。有意思的是，邹容主张宪法、法律诸事，悉照美国。这一矛盾的姿态，最能代表清末革命文学的立场：

① 陈天华：《中国革命史论》，见《陈天华集》（全一册，上编），民智书局1928年版。

② 1903年秋，陈天华在日本写成《警世钟》，初署名“神州痛哭人”。

③ 《革命军》1903年5月初版于上海大同书局，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为躲避当局的搜查，此书后曾用名《图存篇》《革命先锋》《救世真言》。本书参考版本为周永林编《邹容文集》（文集收入《革命军》），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

④ 若细论，《革命军》的一些细节也经不起推敲。邹容恋汉唐辉煌，实则李唐王朝亦有胡人血统，独排“满人”，独尊皇汉族，中国所治疆域则无法自圆其说，这是种族主义的根本局限。《革命军》并举卢梭《民约论》、弥勒约翰《自由之理》、孟德斯鸠《万法精理》等，实则后两者之论与卢梭的绝对自由论有相当大的差别，诸大哲并不能在同一时空让某一文明起死回生。另，邹容声称四万万同胞的革命，若人口比例推论，这四万万是否包括“满人”在内呢。诸多矛盾，不能细究。以修辞取胜，文章充满口号式的道义谴责，《革命军》有其文学气质。

“排满”是首要也是主要的革命任务，在作者看来，似乎“排满”成功之后，洋人的欺负及国人的奴性就能迎刃而解，亡国灭种的危险就能解除。仇恨之情与乌托邦之想并行，《自由结婚》《洗耻记》《狮子吼》《猛回头》《革命军》等革命文学，以明天的希望加重对今天的失望，这种叙事策略增添了革命的号召力。泛而论之，在种族革命问题上，谭嗣同、章炳麟、孙中山等人激烈的“仇满”主张，亦为种族革命文学提供了思想支持。

反对种族之见的革命文学，可视为流派之外的革命文学。蔡元培发表于1904年的小说《新年梦》<sup>①</sup>值得一提。如果说上述作品种族仇恨更甚，那么，《新年梦》乌托邦之想则更强烈。蔡元培有暴力革命之举，但反对种族之见，可将《新年梦》列入“广义革命文学”的范畴。1903年4月11日、12日，蔡元培在《苏报》上发表《释仇满》，称种族之见为“无满不仇，无汉不亲；事之有利于‘满人’者，虽善亦恶；而事之有害于‘满人’者，虽凶亦吉”，事实上，“吾国人一皆汉族而已，乌有所谓‘满洲人’者哉”，汉人与“满人”通婚，血液混杂，“彼其语言文字，起居行习，早失其从前朴鹜之气，而为北方稗士莠民之所同化，此其风习消灭之证据也”，从血液及风习方面来看，皆无种族之别了，所谓“满洲人”的说法，不足为据。无论基于历史还是基于常识，蔡元培的《释仇满》都是有说服力的。《新年梦》不是“仇满”，而是仇“冒充管账的”。作者借演讲者之口声称，“一定要有实力，把这冒充管账逐了，还要与取货的评理”<sup>②</sup>。逐了管账的，不是对“满洲人”的驱逐，而是对治理失败者及制度的批判。同时，小说又借外国人的眼，描述了奴隶的情状，“住在上面，又是些劣等动

<sup>①</sup> 蔡元培：《新年梦》，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原文连载于《俄事警闻》第65、66、67、68、72、73号，1904年2月17、18、19、20、24、25日，署名“中国一民”。《俄事警闻》在日俄战争之后改为《警钟》。

<sup>②</sup> 蔡元培：《新年梦》，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32页。